

民族主義與中國應對 防擴散典則之政策

歷史記憶及主權原則的影響*

游智偉**

收稿日期：2023年4月20日

接受日期：2023年11月15日

* DOI:10.6164/JNDS.202406_23(2).0001

** 國立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E-mail: cwyu@mail.cpu.edu.tw

摘 要

本文結合文字探勘與個案研究，以分析中國政治菁英之間的民族主義是否存在？若果，則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概念——歷史記憶與主權原則，是否影響其官員對不同議題的態度？本文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 2000 年到 2021 年間針對國際反擴散典則的回應文稿為分析標的，並透過是否涉及歷史記憶與是否涉及主權原則而區分為六個案例。本文發現民族主義的歷史記憶確實影響到中國政治菁英應對不同議題的態度，因此中國對生化武器擴散的態度較為負面，也更傾向正面回應生化武器的防擴散典則。因為中國過去為了塑造民族主義而著力宣傳的歷史記憶限制了其對生化武器擴散的態度，而同樣的現象則未出現在中國應對核武擴散的議題。主權原則也影響中國對相同議題的態度，對透明化議題的態度較為負面，因為中國認為透明化及其代表的查驗或情報行動將侵害主權；而相較於可由中國自主決定的進出口管制，中國的態度則較為正面，因為進出口管制未涉及讓渡內政或國內事務的權力。最後，在議題僅涉及透明化的條件下，中國較不傾向以負面詞彙應對涉及生化武器之透明化議題，僅在涉及區域議題或其他國家之際方使用負面詞彙。

關鍵詞：中國外交政策、不擴散、透明化、民族主義、主權

壹、前言

民族主義是討論及解析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現有研究指出中國很可能存在兩種不同面向的民族主義：「國家 / 政治菁英」及「社會 / 大眾輿論」(Gries, 2004)，相較於後者較容易觀察與測量，例如 Johnston (2013) 採用北京社會經濟發展年度調查討論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而 Weiss (2014) 則透過群體性事件與抗議呈現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始終無法找到合理方法討論「國家 / 政治菁英」面向的民族主義。

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與不同學科方法的分享，本文嘗試透過文字探勘——特別是「文字關連網絡」(co-occurrence network) 與個案研究方法的混合，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公開資料檢視與回答以下兩個問題：其一，如何測量中國政治菁英之間的民族主義？不同於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可透過群體性事件或抗議次數及規模觀察、抑或採用調查資料，在幾乎不可能進行田野調查的前提下，透過文字探勘大規模地檢視中國官方對特定議題的觀點與其態度變化應可回答此問題。另一方面，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記憶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爭經驗為中共賴以塑造與宣傳其民族主義的根據，這些內容可歸納為對主權原則的堅持與對特定武器與國家的厭惡。然而，在面對國際社會提問類似議題之際，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不同議題與性質的提問是否會將展現不同態度？

由於中國對反生化武器擴散及反核武擴散典則的參與時間已久，中國於 1997 年加入《禁止化學武器公約》、1984 年加入《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於 1996 年加入《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1992 年加入《核不擴散條約》，並逐步將這些典則的相關規定轉化為國內法。因此，本文嘗試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這兩個議題的態度變化做為分析標的，並將 2000 年至 2021 年間的共計 982 筆回應區分為六個案例，以分別

釐清中國對以下六種狀況／案例的回應態度是否有所不同：包括歷史記憶的生化武器擴散、生化武器的擴散與進出口管制措施、生化武器的擴散與透明化原則、不包括歷史記憶的核武擴散、核武擴散與進出口管制措施、核武擴散與透明化原則。由於透明化原則和進出口管制措施均涉及讓渡部分主權予國際組織或其他國家，因而可以此討論主權原則的影響。而中國在二戰期間遭受的生化武器攻擊記憶，則是中共迄今為止不斷宣傳的民族主義素材之一。

綜言之，在透過關鍵字的選取與排除以提升前述六種案例同質性的前提下，本文發現民族主義的歷史記憶確實影響到中國政治菁英應對不同議題的態度，在排除主權原則（也就是回應議題不涉及任何透明化及進出口管制之際）的案例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更傾向正面回應生化武器的防擴散典則，而對核武防擴散典則的態度則較為保守，而這個傾向同時也影響到中國防止生化武器擴散的實際政策。其次，在排除武器性質差異的前提下，主權原則也會影響中國對相同議題的態度，中國對透明化議題的態度較為負面，但對進出口管制的態度則較為正面，這也呼應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涵——歷史記憶與主權原則。

本文隨後將先回顧相關文獻，包括國際防擴散典則的運作邏輯及其規範內容、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源、樣態與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並在這些文獻的基礎上推論本文的研究問題並提出研究設計。其後，透過文字探勘與個案比較的方式檢視中國在不同案例中對核武及生化武器擴散的立場及渠等使用負面詞彙的傾向及頻率變化，並在第四部分推論中國民族主義內含的歷史記憶與主權原則如何影響中國應對這些議題的政策，最終並提出本文的結論。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一、文獻檢閱

(一) 國際防擴散典則的運作邏輯與規範內容

「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 涵蓋核武、生化武器與相應的投射技術，在國際社會中，裁軍與限武典則多詳細定義其規範項目的特徵與內容，現有管制方式共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方式為禁止相關國家使用、測試、佈署、持有或生產特定類別的武器。第二種方式則為禁止「轉移」(transfer)，其中包括合法與非法的「進口」(export)、「出口」(import)、「運輸」(transit)、「轉口」(trans-shipment) 及「仲介」(brokering) 等行為。增加參與國之間在相關政策領域中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前述兩種管制方式尤側重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特別是生物與化學武器的禁止規範，這類管制分為全球條約、技術管制與建制和國內出口管制等三層次 (袁易，2004)，強調從源頭的供應國 (supplier state) 管制出口，並由國際組織或條約制訂保障體系與管制清單，例如現有五個無核區條約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規範主要以「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規範之「保障體系」(safeguards system) 與管制清單 (包括核能材料、放射性材料與廢棄物等三類) 的定義為主，管制清單的內容與轉讓規定則依據「核供應國集團」(the nuclear suppliers) 與「桑格委員會」(Zangger Committee) 的定義為主 (袁易，2005：108)。

第三種方式為增加參與國之間在相關政策領域中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第四種方式則為典型的裁軍。而這兩種方式均與「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 的概念息息相關。透明度強調參與國家必須提高彼此對各方在武器獲得、轉移與佈署之間

的資訊瞭解程度，例如《海牙反彈道導彈擴散準則》與《開放天空條約》。在核武的裁軍議題中，透明度往往被細緻化為定期系統性地通報儲藏數量與裁減步驟（Muller et al., 2013: 55）。但相關條約規範的檢驗選項也可能影響透明度高低，特別是檢驗選項背後的財政「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與「可信度」（confidentiality）影響該條約的查驗機制是否能獨立運作（Sossai, 2013: 415-416），因而透明度往往是裁軍條約中最重要、卻最難被達成的部份。例如，即便在聯合國的決議與運作下，「常規武器登記資料庫」（UN 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中的多數資料為「無關」（irrelevant）、「低品質」（low quality）或「錯誤」（inaccurate or false）資料，無法完整地呈現各國在常規武器的貿易與轉移情形（Wulf, 2000: 89-90），同時也是檢驗國家承諾效力的有力證據之一。

即使透明度的提升與維持為國際防擴散典則運作的重要因素，但各國仍有其考量而使透明化遭遇困難，因而透過科學證據檢驗便成為協力廠商提升與維持透明度的重要工作之一。《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於 1999 年變著手建立國際監測系統以透過科學證據檢驗是否試爆核武，該計劃透過興建監測站以檢視「地震」（seismic）、「低音波」（infrasound）、「水聲」（hydro acoustic）與「放射性核素」（radionuclide）等可被探測的實證資料以監測全球核武試驗（Brely, 2010）。

大抵來說，前述四個方式的共通點在於「制度化」管制清單與進出口及轉移規範，並「透明化」彼此做為與議題已降低不確定性並強化參與國家之間的信心。制度化的推動有助於協調各國立場並建構跨疆域與多層次的行動計畫，例如國際反核武擴散體系的建構相當有賴於 IAEA 將相關管制標準、管製品清單與管制方法制度化（Kumar, 2014: 45）。透明化措施的確立與執行則可降低對彼此能力和意圖的疑慮與不確定性（Zarimpas, 2003: 7），有助於強化各國對彼此的信心。例如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相關條約與典則中的透明化措施，均成功

降低敵對國家間的敵意或提昇參與國之間的信心 (Chevrier, 2007: 41; Arbman, 2003: 125)。

(二) 中國民族主義的緣起、組成與影響

歷史記憶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成分，「文化主義」(culturalism) 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源之一 (Townsend, 1992)，因而「華夏」或「天下」的概念為其核心概念 (Zhao, 2004: 13)。而中共對這類歷史記憶的操弄更是不遺餘力，其透過黨史記錄與國家控制的媒體不斷傳播清末以來的戰爭記憶，例如鴉片戰爭、八年抗戰與韓戰 (Weatherley & Zhang, 2017: 3)。實際上，中共有意識地將民族主義轉化為愛國主義以做為整合社會的意識形態 (Choi, 2010: 44-45)，重點在於維繫民眾對國家的忠誠 (Zhao, 2013: 537-538)，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後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便是一例 (Johnston, 2013: 7)，而隨著共產主義做為意識形態教條的價值降低，政策表現逐漸成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基礎之一時，經濟發展與民族主義便成為衡量中共合法性的指標 (Weiss, 2014: 226)。

實際上，這類歷史記憶往往涉及中國從 19 世紀以來的歷史記憶，因而對主權的堅持一直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充分條件之一。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反西方，而是反對任何可能損害中國主權的潛在威脅 (Guang, 2005)，因而主權才是重點，反西方僅是維護主權的手段。這樣的操作不論是在中小學教科書或 COVID-19 其間的形象建構均可見一斑。中國的中小學教科書併陳論述國家光榮與主權原則，並將其他國家視為可能是敵人或支持者的「他者」(Hao & Cherng, 2020)。而 COVID-19 期間，中國對其國家符號(特別是國旗)的維護源於民族主義對他者的不滿意，從對丹麥新聞媒體的反制外溢到香港的主權及安全爭議，到疫情危機導致民眾對國家符號的焦慮，而北京將之與主權連結並以此反制他國的輿論爭議 (Schneider, 2021)。

其次，部分研究認為不同領導者對民族主義在其外交政策中，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態度。由於領導者選擇的正當性基礎不同，各別領導者對民族主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胡錦濤時期偏重以經濟發展為主，而習近平則偏重以民族主義與國家光榮為根本（Ross & Li, 2016: 250），而若領導者偏向以民族主義做為政權基礎，民族主義將產生由上而下的全面影響。例如習近平時期中共較諸過往更積極的外交政策，可能源於習近平個人的民族主義情節（Goldstein, 2020）。但有研究則認為領導人的差異並不重要，而是取決於中國面臨的國內外事件。例如中國民族主義的浪潮在 2008 年後增加係因中共領導人的操弄，以及北京奧運的舉辦與西藏的動亂（Yahuda, 2013: 454-455）。而即便是前述研究認為態度較保守的胡錦濤，其於 2009 年中共國慶的演說也較 2008 年奧運開幕式時，帶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氛圍與詞彙（Gries et al., 2011）。

再者，現有研究對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背景對中國民族主義如何影響其外交政策的機制則有較清楚的共識——當綜合國力仍有所不足且經濟快速發展之際，中共傾向抑制民族主義的影響；相反地，當綜合國力較為充足之際，民族主義的影響則更為顯著。Zhao (2013: 541) 認為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中共有意識地壓抑民族主義以避免挑起歐美對抗。而在中國綜合國力增長與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下，民族主義將促使北京著力發展海權與海軍，最終提升北京在爭議海域採取強硬政策的可能性（Ross, 2009: 68）。實際上，民族主義制約著中共處理爭議領土（海）議題上的政策選擇空間，因而更傾向維護爭議領土（海）的領土主權完整（Li, 2016: 124）。

最後，Peter Gries (2004: 136) 的觀察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可能存在「國家 / 政治菁英」及「社會 / 大眾輿論」等兩種面向，後者也可對中國外交政策施壓。先以 Gries 的架構檢視前述研究，渠等多未清楚地定義其「民族主義」究竟屬於國家或社會面向，抑或以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為主要的研究客體。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13: 37-42) 採

用「北京社會經濟發展年度調查」(The Beijing Area Study)的數據推論的中國民族主義便屬於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此外，Gries 認為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可施壓外交政策，但近年的研究指出只有在特定條件下，輿論和民族主義才可能發揮制約效果 (Quek & Johnston, 2017/18)，因為民族主義必須搭配其他因素才能制約或影響政策，這些因素包括菁英意見、領導者個人偏好、安全困境、組織利益與前述因素的複合原因等 (Johnston, 2016/17)。

二、現有研究引導出的問題、研究方法與假說

(一) 現有研究的貢獻與其引導出的問題

大抵而言，現有針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文獻確認了四個重點：第一，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被刻意創造的產物，目的在於維持統治，內容源於中國的歷史記憶，因而對主權的堅持及對特定戰爭的歷史經驗均為其根源。第二，不同領導者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程度有異。第三，綜合國力的成長將助長民族主義的信心，但經濟的快速成長則有助於抑制民族主義的影響。第四，中國的民族主義存在「國家/政治菁英」與「社會/大眾輿論」兩個面向。

然而，比較前述回顧的三類文獻卻引導出以下問題：第一，國際防擴散典則的運作機制很可能觸動中國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特別是在透明化或特定原物料的進出口管制上。回顧中國民族主義的面貌，恢復歷史光榮為其重要成分之一，更是習近平的主要偏好 (Ross & Li, 2016: 250)，但主權議題更是中國關心至甚者，不論當下是否涉及爭議領土，中國對仍有領土主權爭議的周邊國家 (例如日本與印度) 之態度往往較為敏感，例如領土主權爭議曾阻礙中共改善日中關係的努力 (Chong & Hall, 2014: 32)。

相對地，即便不存在領土主權爭議抑或提議國家與中國的關係良

好，若涉及主權完整與尊嚴，中國仍可能斷然調整政策以維護主權完整。1950年代末期的長波電台事件與1960年代中蘇共分離是很好的案例。1958年蘇聯提議在中國境內興建長波電台及成立聯合艦隊，毛澤東認為兩事均為前蘇聯侵犯主權並希望軍事控制中國的策略，誠如毛澤東後來會見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時所言：「我們（中蘇兩方）在1959年決裂，他們1958年想要控制中國海岸與海港時，我們開始失和。」（顏聲毅，2004：215）。

第二，理論上，在黨國體制的控制下，領導者個人因素與其政策路線的選擇才會左右民族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對政策——特別是高度政治性的外交政策的影響有限。現有研究多半著重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Johnston, 2013; Weiss, 2014），但中共控制輿論的政策確實有助於避免輿論施壓政府，以最難控制的網路言論來說，網路審查機制的重點在於避免集體抗議，並輔助政策，例如在中國與越南於2011年6月25日針對南海爭議達成協議的前夕，中國對此議題的網路審查頻率大幅下降，暗示即將達成的協議（King et al., 2013）。King等人的觀察暗示著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對國家的影響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中國賴以凝聚支持以推動政策的工具。

若欲探討民族主義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更重要的應為討論「國家／政治菁英」面向的民族主義如何影響政府，但這也延伸出另一個問題：如何測量這類民族主義？大規模地檢視中共官員對相同議題或國家的論點應可相當程度地反應其政治菁英之間的民族主義，但這類研究方法僅能檢視「少數案例」（small N），無法更有效地檢視大量案例、甚至推論解釋力更強的通則。此外，檢視少數個案的研究卻又可能受到外在變數的影響，因而以中國國家／政治菁英面向的民族主義為對象的研究較少，且其發現多集中在特定國家或爭議中，未能將其論述拓展至特定的價值或議題。

(二) 案例的選擇、研究設計與方法

誠如前述，中國的民族主義至少有領土主權、對日與對美等根源。本文嘗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遵守國際防擴散典則的代價之一為讓渡部分主權，特別是對透明化機制的遵守與進出口及轉移措施的防範，而這類議題是否將觸發中國民族主義，致使中國官員的回應特別劇烈？其次，美國與日本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議題，在中國與國際防擴散典則的互動中，若議題同時涉及日本與歷史記憶，也就是二戰期間的化武事件，中國官員的回應是否帶有更濃厚的情緒詞彙，同時也呈現更明顯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測量中國「國家／政治菁英」面向的民族主義？本文並嘗試採用網路爬蟲與「文字探勘」(text-mining)等方法，並結合個案研究的設計以回答前述三個問題。

選擇以中國應對國際防擴散典則的政策為例，係因此議題可幾乎排除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權力結構變化與國內外情勢的影響。其一，如何應對國際防擴散典則的透明化機制與進出口管制同時橫跨外交與國防議題，因而僅能透過衡量「國家／政治菁英」面向的民族主義回答此問題，社會面向的民族主義——即便其確實有能力影響政府，則因議題的高階政治性而不太可能影響政府政策。其二，相較於以中國周邊領土主權爭議為案例，長期來看，這類議題很可能受到中國與爭議國家的綜合實力變化及中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所處位置的影響，例如中國處理釣魚台列嶼的政策在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便有所不同。其三，短期來看，國內外情勢的變化也可能影響中國對爭議議題的態度，但中國如何因應透明化機制與進出口管制則沒有這個問題。

基於前述理由，本文選擇討論中國應對國際防擴散典則的政策，並以中國應對核武與生化武器的防擴散典則為案例，分別檢視中國防止核武與生化武器擴散的政策是否受民族主義影響。第一個案例(I)為中國應對《化武公約》的政策，該公約第四條、第五條與第六條分

別規範化學武器成品、生產設施與例外活動的禁止內容及標準和查核方法；該約第 9 條第 8 款至第 25 款規範了「事實調查」(challenge inspections) 與觀察員的權限及權利，該條賦予會員國在認為有疑義時可透過化武公約組織秘書處向他國派遣觀察員檢視相關基地與設備，因而案例 I 的重點將置於北京對於化武公約類似條款的態度變化。案例 II 則將重點放在化武公約的「化學品附件」(Annex on Chemicals) 與《澳洲集團》(The Australia Group [AG]) 的規範項目，檢視的重點在於中國如何應對這些管制進出口貿易與轉移的政策與中國外交官員的回應態度。

第三個案例 (III) 則將檢視中國對 IAEA 與《全面禁止核試爆條約》的態度，特別是對相關查驗機制與實踐的態度，IAEA 有權派員觀察或監控相關管制物品及技術在締約國境內的活動與轉移，而《全面禁止核試爆條約》第四條則規範了監測方法與系統，該條約也賦予締約國請求全面禁止核試驗組織秘書長針對特定國家展開實地調查的權限。第四個案例 (IV) 則將檢視中國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核供應國集團和桑戈委員會的態度，並檢視中國對相關設備進出口與轉讓的態度，《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禁止締約國轉讓核武成品、核供應國集團禁止締約國出口可能被用於製造核武的設備與原物料。

其次，本文認為交叉比較前四個案例可釐清歷史記憶與主權原則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如表 1 所示，因為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境內實驗、製造與使用生化武器，而反日情節與對日本於二戰期間在中國的戰爭記錄則為中共塑造其民族主義的重點之一，因而本文認為中國防止化武擴散的政策與態度很可能受其民族主義影響；相較之下，中國並未遭遇任何核武攻擊，因而中國防止核武擴散的政策與態度便不會受其歷史記憶的影響。另一方面，這兩類國際防擴散典則的透明化實踐包括派遣觀察員實地訪視，因而這類措施涉及主權原則，因而比較「案例 I 與案例 II」及「案例 III 與案例 IV」兩組應有助於檢

視當國際社會希望派遣人員進行實地考察時，中國的態度是否較不涉
及此議題時強硬或負面。

表 1 案例的分類與設計

		歷史記憶	
		涉及(生化武器擴散)	不涉及(核武擴散)
主權原則	透明化	I：協力廠商查驗	III：協力廠商查驗
	進出口管制	II：進出口管制	IV：進出口管制
涉及他國、但不涉中國的議題		V：生化武器擴散	VI：核武擴散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最後，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加，中國回應涉及他國但與中國無涉之
生化武器擴散(案例 V) 或核武擴散(案例 VI) 的頻率越來越高，而對
這類議題的回應往往不僅止於中國對相關典則的態度，同時也涉及中
國對區域議題或個別國家的立場，因此本文透過案例 V 及 VI 分離類似
案例，以抽離中國對區域議題或個別國家立場所造成的影響。

在文字探勘方法的使用上，本文將把這些方法用於更系統性地整
理個案資料，並使用開源程式「KH Coder」(版本為 3.Beta.04f) 分析，
該程式可進行質化的內容分析、文字探勘與初級的「自然語言程式」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並可解讀判別簡體中文等 13 種語言。¹ 本
文將採用「文字關聯網絡」(co-occurrence network) 檢視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在不同條件下的態度變化，並著重衡量字詞之間的關聯性。這個
方法的優點為每一文本主要的標題不會因為複雜度的增加而被排斥，
因而能較為衡平地衡量標題與內文各別字詞的關係 (Fruchterman &
Reingold, 1991: 1160)。「餘弦相似性」(Cosine similarity) 將先計算關
鍵字詞在每 1,000 字的出現頻率以做為調整參數，其後再檢視關鍵字

¹ 該程式能判讀的 13 種語言分為：加泰隆尼亞語、中文(簡體)、荷蘭語、英語、法
語、德語、義大利語、日語、韓語、葡萄牙語、俄語、斯洛文尼亞語和西班牙語。

在各別文件的出現頻率，藉此以將建構文字關聯網絡的重點置於出現頻率 (Higuchi, 2017: 47-48)。最後，並要求程式對文字之間的關連性進行卡方檢定，並呈現字詞之間的標準化關聯係數，以確認字詞與字詞之間的關連性具有統計上的意義，且可逕行比較其關聯性。

(三) 資料來源、變數定義與測量

本文透過爬蟲程式擷取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頁面下的外交部新聞記者會資料，該網站資料涵蓋自 2001 年 9 月 4 日迄今的新聞記者會全文，本文透過 16 個關鍵字選取，² 再刪除重複計算的資料與僅提及「防擴散」，但未明確界定領域（生化武器或核武）或目標（透明化或出口管制）後，篩選出 982 筆資料。其後，以包括「查驗」等 10 個關鍵字過濾屬於「透明化」的資料，³ 屬於案例 I 的資料共 50 筆、屬於案例 III 的資料共 354 筆；以「出口」等 10 個關鍵字過濾屬於「進出口管制」的資料，⁴ 屬於案例 II 的資料共 30 筆、屬於案例 IV 的資料共 258 筆；前述 20 個關鍵字未曾過濾的資料則屬於案例 V（共 91 筆）與案例 VI（共 199 筆）。⁵

² 這些關鍵字包括：化武、化學武器公約、生化武器公約、生化武器、生化武器、化學武器、澳大利亞集團、核子武器、核武、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核供應國集團、桑戈委員會、國際原子能機構、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核擴散、防擴散。

³ 這 10 個關鍵字包括：透明、查驗、查核、調查、核查、國際原子能機構、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觀察員、化學武器公約、化武公約。

⁴ 這 10 個關鍵字包括：出口、進口、轉移、擴散、澳洲集團、化學武器公約、生化武器公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核供應國集團、桑戈委員會。

⁵ 包括前述案例的資料庫、相關編碼、排除詞彙與採用詞彙檔案可見以下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qtuOCoxMWc-O7h3Kjrrppo9qNjugG6/view?usp=sharing>。網址內包括五個檔案，檔名為 mad new.khc 之檔案可直接讀入 K. H. Coder，其餘三個文字檔分為：阻斷詞、挑選詞與整合分析所用；Excel 檔案則為原始資料。在原始資料的呈現上，本文將記者的提問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回答置於同一欄位，因為本文的研究並非僅單純檢視特定詞彙的變化頻率，而是透過不同情緒詞彙的

表 1 的內容已相當程度地暗示了本文定義的自變數，第一個自變數為「歷史記憶」，亦即中國對該議題是否有共用的歷史記憶，而在生化武器與核武兩者之間，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大陸曾部署、使用並研發生化武器，而這也是中國在 1978 年後不斷宣傳塑造其民族主義的論點之一；相較之下，中國未曾遭受核武攻擊，因而渠等對核武並沒有歷史記憶。第二個變數則為是否涉及主權原則，也就是「透明化」與「進出口管制」兩者，透明化意指國際組織或第三國派遣觀察員至國家境內檢視是否違反國際規定；進出口管制則視國家是否遵守國際條約或組織定義之禁止出口、進口或轉移之技術、設備、原物料與半成品。

本文設定的依變數則為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測量的對象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不同領導人、不同議題或目標的態度是否有所變化，本文挑選了 33 個正面詞彙與 30 個負面詞彙（如表 2 所示），挑選的標準係根據其出現頻率與特殊性，這些詞彙在本文分析的資料中均曾

表 2 情緒詞彙的挑選

面 向	目 標 詞 彙
正面情緒詞彙 (33)	一貫支持、一貫重視、公正、友好、支持、充分、交涉、並行不悖、歡迎、負責任、堅決支持、堅定不移、和睦、坦承、建設性、重要、重視、祝賀、高度重視、高度讚賞、毫無疑問、強烈、強烈支持、普遍支持、普遍歡迎、感謝、慎重、滿意、謹慎、願與、讚賞。
負面情緒詞彙 (30)	一貫反對、一貫譴責、不負責任的、不滿、雙重標準、反對、傷害、危險、嚴正、嚴正交涉、嚴正譴責、嚴重傷害、嚴重侵犯、嚴重錯誤、困難、堅決反對、堅決譴責、抗議、高度警惕、強烈不滿、強烈反對、強烈抗議、強烈憤慨、強烈譴責、憤慨、普遍反對、普遍譴責、錯誤、譴責、警惕。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設計以檢視中國對不同議題的態度，因此單純的字頻變化並不會影響本文的推論及研究成果。

出現 10 次以上。本文蒐集的案例共計出現 8,640 種詞彙，每詞彙出現的平均數 (terms of frequency [TF]) 為 8.45 次，而鑑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威權性質，本研究將忽視中國領導人與外交官的差異，並將表三呈現的正面與負面情緒詞彙分別歸類為不同群體，透過各別案例檢視在不同情境下，中國官員使用正面與負面情緒詞彙的傾向。

最後，在正面詞彙與負面詞彙之間，究竟何者較能直接反應中國的態度或立場？本文將以負面詞彙的出現傾向及頻率做為最主要的檢視標準，因為外交辭令往往包括許多華麗的正面詞藻，因而檢視正面詞彙無法直接反應官方的真實態度。此外，由於本文涵蓋的案例範圍始於 2001 年 9 月，其間橫跨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三任領導人，透過正面詞彙測量真實態度的變化也更容易受到個別領導人執政風格的影響。例如在習近平時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同一問答間使用正面詞彙的平均數明顯下降，但使用負面詞彙的平均數卻未有顯著變化。因而透過負面詞彙的比較較有助於檢視其真實態度。

三、中國對國際防擴散典則的態度變化

(一) 各別案例關心的議題

根據前述的方法，圖 1 呈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 2000 年到 2021 年間在六個案例中的關心議題與差異。在涉及歷史記憶與透明化的案例 I 中，中國關心其與美國、禁止化武公約、禁止生化武器公約及相關國際組織的互動，對「核查」與「銷毀」的態度相當正面，與「核查」(coef.=0.45) 關聯度最高的五個關鍵字依序為議定書、銷毀、化武、不可逆、國際原子能機構；而與「銷毀」(coef. 0.45) 關聯度最高的五個關鍵字依序則為化武、核查、敘利亞、化學武器、日本。其次，中國在案例 I 對在禁止化武組織的態度則相當正面，除化武、敘利亞等議題外，同時也依序關注銷毀、技術秘書處、通報、核查等議題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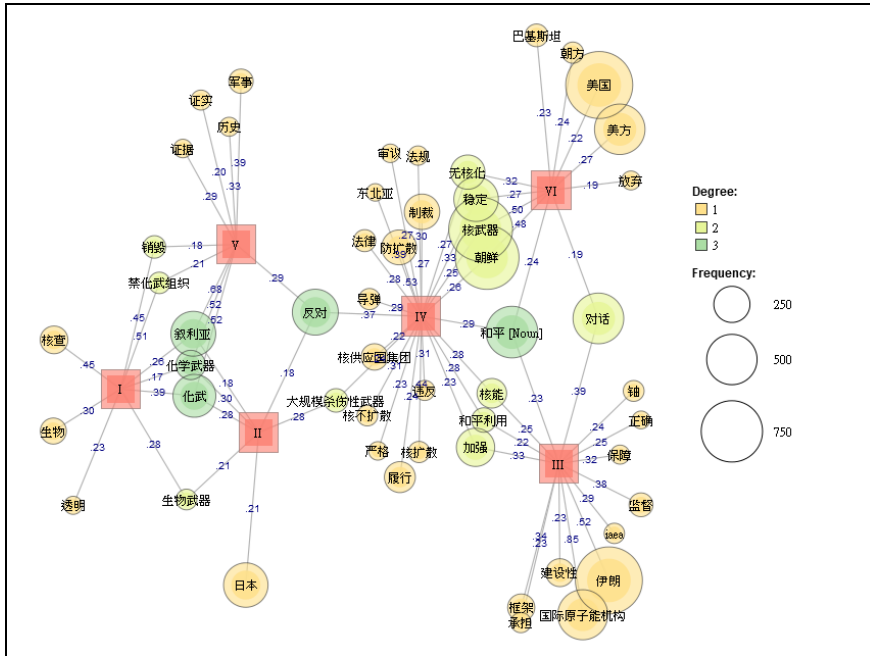


圖 1 各別案例關心的議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明：前 75 個詞彙 (Coef. ≥ 0.218 ；詞彙最低出現次數：50；每詞彙至少需在每筆資料出現 1 次)。

例如在 2017 年回應美國在安理會提案要求「禁化武組織——聯合國敘利亞化武聯合調查機制技術性延期決議草案」，北京出人意料地支持美國的提議（中國外交部，2017a），這也是中國在同時期內少數未針對敘利亞案動用否決權的案例之一。

其次，在涉及歷史記憶與出口管制原則的案例 II 中，中國除仍關心生化武器的議題之外，也在意中日關係及日本對生化武器的態度。除一再強調反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與生化武器之外，更值得留意的是「核查」與「進 / 出口管制」等詞彙的出現頻率及其與各別詞彙的關聯性並未通過統計檢定，因而中國在案例 II 對「核查」及「進 /

中國外交部出口管制」的態度並不積極。最後，案例 II 也有不少涉及日本的討論，與日本關聯性較高的七個詞彙依序為「遺棄」、「外相」、「境內」、「銷毀」、「在華」、「化學武器」及「軍國」，反應北京相當在意日本於二次大戰期間遺留在中國境內的化學武器，並要求日本負責銷毀以對過去的軍國主義負責。

最後，在涉及歷史記憶，但僅涉及其他國家的案例 V 中，歷史問題仍是中國強調的重點，但不同於案例 II，北京強調的是尊重及正視「人類社會使用生化武器的歷史」，因而北京對禁止化武組織的態度及銷毀化武的立場也更為正面。與「歷史」關聯性較高的關鍵字依序為「經得起」、「檢驗」、「正視」、「正確」與「反省」等，反應北京對歷史議題的整體態度，特別是在不直接涉及中國的議題中，例如中國對敘利亞是否使用化學武器的議題中，中國往往表示：「譴責近日在敘利亞發生的生化武器襲擊事件，支持聯合國有關機構對所有使用或疑似使用化武事件進行獨立、全面的調查，以確鑿證據為基礎，得出經得起歷史和事實檢驗的結論。」（中國外交部，2017b）。2018 年對敘利亞爆發生化武器攻擊事件的回應也類似：「對於疑似使用化武事件，中方支持進行全面、公正、客觀的調查，基於科學調查方法和確鑿有力證據，得出經得起歷史和事實檢驗的結論。」（中國外交部，2018a）。

然而，在案例 V 中也包括某些涉及日本與美國之議題的反應，這些反應凸顯民族主義的影響相當明顯。在同時涉及日本與美國的議題中，中國外交部 2021 年對環球時報提問：「美國以豁免日軍『731 部隊』戰犯責任為條件，獲取日軍生化武器研究的數據，美國德特裡克堡基地正是在此基礎上快速成為生化武器研發基地。」的回應相當直接，中國外交部指責：「美國遍佈全球的 200 多個實驗室分佈同近年來一些危險疾病和病毒蔓延始發地分佈情況非常相似。聯繫到上述美國軍方與『731 部隊』互相勾連的歷史，我們很想知道，美國在境內外開展生物軍事化活動的重重疑雲什麼時候才能揭開？美國什麼時候

能給國際社會一個交待？」（中國外交部，2021a）。

從提問者（環球時報）的性質及提問者指稱的外媒報導——實際上為新華社的英文報導來看（Xinhua, 2021），即便該次問答的主要目的應為回擊國際社會指責中國應負責 COVID-19 爆發及散佈，但從中國官方長期對此議題的態度來說，此仍反應著深厚的民族主義影響。這類論述最早見於 1983 年的華盛頓郵報報導（Dahl, 1983），在 1983 年到 2021 年間，並沒有任何更進一步的證據補充美軍與日軍的交易內容，但中國海外官媒及駐外機構則持續宣揚這個論述（Zhu, 2018；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里約熱內盧總領事館，2020），因而中國外交部 2021 年 6 月對環球時報的回應並非僅止於回應 COVID-19 的指責，同時也包括民族主義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不涉及歷史記憶但涉及透明化的案例 III、涉及出口管制的案例 IV 及涉及其他國家的案例 VI 中，中國更關心其他國家的核武擴散，雖然其對美國的不滿立場也相當明顯，但這類不滿多數涉及對相關國際條約及規範的不同解讀。案例 III 多與伊朗及國際原子能機構有關，中國則不斷強調應在聯合國及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框架下處理伊朗核武問題。其次，國際組織——特別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為中國對核武擴散議題及中國對他國（例如巴基斯坦）出口核能技術的依據，但同時中國也以此要求歐美國家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不得擅自解讀既有規定及借用規則漏洞達成特定目的。⁶

案例 IV 則多半與核武出口管制及完善核不擴散體制有關，在涉

⁶ 特別是中國近年對 AUKUS 的回應，例如 2021 年 9 月 29 日的記者會：「正如格羅西總幹事所言，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是無核武器國家首次引進核潛艇，將導致高濃鈾脫離機構的保障監督。簡而言之，這是三國惡意利用國際規則漏洞，赤裸裸地開展核擴散活動。機構對澳核潛艇保障監督將創設先例，事關機構所有成員特別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的權利和義務，並對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產生深遠影響。」（中國外交部，2021b）

及「出口管制」的案例中，北京不斷強調等遵守各領域出口管制法規，並已將相關出口法規法制化為國內法，這也與相關研究的論點相仿（Johnston, 2008; Kent, 2007）。而核不擴散體制的議題上，北京則主張強化「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與「核供應國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的連結，以此做為防止核武擴散的國際機制，要求希望加入 NSG 的國家應先以非核武國家的身份簽署 NPT。此外，另一個中國對核不擴散體制的態度則與前者相仿，要求歐美國家遵守 NPT 與 NSG 規範，並以此指責歐美國家的相關行動，例如美國、英國與澳洲在核潛艇議題上的合作（中國外交部，2021b）。最後，在案例 VI 中，北京關心的議題包括北韓核武危機與歐美國家質疑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核能合作，此外也著重指責美國對發展核武的雙重標準。在指責美國對發展核武的雙重標準中，除前述對美英澳合作生產核潛艇一事之外，中國也著力指責美國對其核武技術的研發及新型核武的生產，要求美國應切實履行核武裁軍的特殊及優先責任（中國外交部，2020a），並對應中國對「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CTBT]）的實踐（中國外交部，2020b）

案例 I、II 與 V 及案例 III、IV 與 VI 分別整理中國面對防止生化武器與核武擴散典則或議題的態度，兩者呈現兩個很重要的差異。首先，在涉及防止生化武器擴散的議題上，北京更傾向與國際典則或平臺展開對話，特別是《禁止生化武器公約》和禁止化學武器組織，並鮮少回擊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對防止生化武器擴散的不力作為，少數例外均發生於 COVID-19 爆發後，此應與其嘗試分散國際壓力有相當關聯性；相對地，在涉及核武擴散的議題上，北京除宣稱遵守國際典則及規範之外，更著重以國際規範批評、制約美國的政策。其次，中國僅在案例 II、V 與 IV 中不斷強調反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這也許是因為案例 II 與 IV 同時涉及進出口管制相關議題，也可能因

為案例 II 與 V 均為生化武器的反擴散，而中國在同樣屬於生化武器、但著重透明化原則的案例 I 則鮮少提出此論點，這也許是因為透明化原則對主權的傷害更大，因而北京較不願正面回應所致。

肆、各別案例的態度差異

從圖 2 的結果來看，歷史記憶對中國應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態度應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同樣均討論透明化的案例 I 與 III 之中，中國在案例 III 中更傾向以負面詞彙應對，因為其標準化關聯係數為 0.30 ($p < .05$)，而案例 I 則為 0.20 ($p < .05$)；案例 II 與案例 IV 的比較也呈現相同現象，案例 II 與負面詞彙的標準化關聯係數為 0.14 ($p < .05$)，而案例 IV 則為 0.17 ($p < .05$)。然而，若不涉及相關國際條約或典則，而僅止於區域議題之際（也就是案例 V 與 VI），北京的反應則完全相反，更傾向以負面詞彙回應生化武器擴散議題，因而案例 V 使用負面詞彙的標準化關聯係數為 0.28 ($p < .05$)；而在案例 VI 則僅止於 0.17 ($p < .05$)。「案例 I 與案例 III」和「案例 II 與案例 IV」的相同傾向及「案例 V 和案例 VI」的相反傾向則反應歷史記憶的影響，因為在中國官方的宣傳中，中國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生化武器荼毒，因而渠等對防止生化武器擴散的國際典則遵循程度極高，但生化武器擴散或使用生化武器的案例之態度則較為負面。

其次，在討論到透明化及進出口管制之際，中國對透明化及協力廠商查驗的態度較為強硬，對進出口管制的態度則較為緩和。在同為化學武器的案例 I 與 II 中，中國在案例 I 中更傾向使用負面詞彙描述其立場 (coef.=.20, $p < .05$)，而在案例 II 中，中國使用負面詞彙的關聯係數下降至 0.14 ($p < .05$)；這兩組比較反應著北京對透明化及協力廠商查驗的接受程度較低，因為北京更傾向以負面詞彙描述其立場。然而，必須進一步解釋的是為何在案例 I 中，中國使用正面詞彙的關聯

性為 0.15，而案例 II 中使用正面詞彙的關聯性則為 0.06 ($p<.05$)，因為案例 I 的議題均為是否在第三國履行透明化及協力廠商查核，特別是聯合國與禁止化學武器組織派遣專家進入敘利亞調查一事，中國對這類議題的態度均相當正面。

另一方面，同為核武的案例 III 與案例 IV 也呈現類似現象，北京在案例 III 更傾向以負面詞彙描述其對透明化的態度 ($\text{coef.}=0.30, p<.05$)，在案例 IV 則為 0.17 ($p<.05$)；在案例 III 中使用正面詞彙的標準化關聯係數為 0.40 ($p<.05$)，案例 IV 則為 0.21 ($p<.05$)，這兩組差異反應類似現象，北京對進出口管制的接受程度較高，但對透明化的接受程度較低，因而北京更傾向以負面詞彙描述其對透明化的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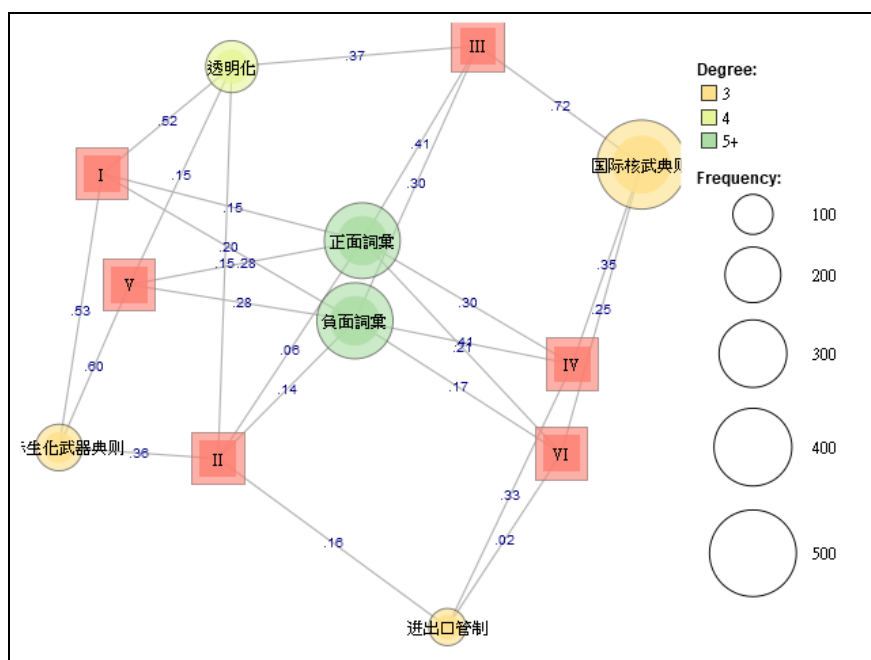


圖 2 各別案例反應的議題與態度差異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明：以出現頻率最高的前 25 詞彙為測量對象， $\text{coef.} \geq 0.228$ 。

而與前者相同的是案例 III 的議題多與北韓核武危機及六方會談有相關，而當回應議題涉及北韓核武危機之際，北京的回應往往較為緩和，強調應在現有架構下進行討論，而非引入協力廠商查核——這也是北韓接受程度較低的議題之一。

綜言之，從主權性質與定義來看，前述發現相當符合透明化及進出口管制對主權的傷害，因為透明化措施讓渡的主權更勝於進出口管制。從透明化的定義來看，透明化在取得偵察他國持有武器數量與研發能力的同時，也賦予他國偵察本國同樣議題的能力，因而透明化讓渡之權力對國家安全及主權的影響更勝於進出口管制，而北京對透明化及協力廠商查核的態度較為尖銳則有其合理性。

其次，中國應對生化武器擴散的態度之波動幅度低於其應對核武擴散的態度，此現象反應中國對生化武器的立場較為集中，不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相反地，應對核武擴散的立場則較為分散，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響。不論是同為透明化議題的案例 I 與 III 或同為禁出口管制的案例 II 與 IV，中國回應核武擴散之際使用情緒詞彙的頻率均高於其應對生化武器擴散的頻率，這個現象同時反應出歷史記憶與中國對不同區域議題之態度的影響。

伍、討論

一、歷史記憶的影響

圖 1 與圖 2 的比較反應兩個結果：其一，從各別議題使用負面詞彙的關聯性來看，中國對生化武器防擴散議題的態度較為正面。其二，中國對生化武器防擴散議題的態度較為集中，對核武防擴散議題的態度波動較大，因為北京雖然更傾向以負面詞彙應對核武議題，但同時也使用更多正面詞彙。即便本研究認為負面詞彙的使用頻率更能反應中國對特定議題的真實態度，但仍無法解釋為何中國在核武防擴散議

題為何也使用更多正面詞彙因應，以及為何這兩個結果反應歷史記憶對中國應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防擴散典則的影響。然而，若檢視表四的描述統計則可相當程度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就第一個趨勢來說，如表 4 所示，在中國僅需回應反生化武器擴散典則的 13 個案例中，中國均以正面詞彙回應生化武器典則；相對地，在中國僅需回應反核武擴散典則的 123 個案例中，中國共以 138 個正面詞彙及 83 個負面詞彙回應。兩者相較除呼應前述圖 2 的發現——中國應對生化武器擴散的態度波動幅度低於其應對核武擴散的態度之外，同時也反應中國對生化武器典則的接受度高於核武典則。不僅因為在剝離區域議題的情況下，中國並未採取負面詞彙回應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澳大利亞集團與禁化武組織之外，中國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核供應國集團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的回應則包含將近 38% 的負面詞彙。

其次，當中國必須同時回應生化武器典則及區域議題之際，中國使用負面詞彙回應的次數便增加至 80 次，而這些案例多半與敘利亞、美國和日本有關。在與敘利亞相關的 43 個案例中，北京僅在 25 個案例中使用負面詞彙，除三個案例之外，均同時使用正負面詞彙回應之。⁷ 而涉及日本的 12 個案例中，8 個案例涉及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遺留在大陸境內的化學武器及後續處理問題，北京也更傾向採用負面詞彙回應。而涉及美國案例則與 COVID-19 疫情及美軍的生化武器實驗有關。換句話說，在涉及生化武器的議題中，中國僅在涉及其他國家的議題中使用負面詞彙，因為這些區域議題的性質導致中國使用負面詞彙，而生化武器防擴散典則的議題則不會導致北京使用負面詞彙。

⁷ 這三個案例分別是：2013 年 9 月 11 日，回應「維基解密」資料顯示，敘利亞化武的化學藥劑與導彈來自俄羅斯、伊朗與中國（中國外交部，2013）；2014 年 4 月 15 日回應敘利亞哈馬省的化學武器攻擊事件（中國外交部，2014）；回應美國隨時準備以軍事手段因應敘利亞情勢極可能發生的化武攻擊（中國外交部，2018b）。

表 3 中國在各別案例中使用正面及負面詞彙的傾向*

案 例		I	II	III	IV	V	VI	總計
正面詞彙用量	涉及核武典則**	N/A	N/A	104	38	N/A	0	138
	涉及生化武器典則***	6	8	N/A	N/A	5	N/A	19
	涉及核武典則及區域議題****	N/A	0	346	66	N/A	4	416
	涉及生化武器典則及區域議題*****	67	15	N/A	N/A	61	N/A	143
	區域議題	18	5	40	182	116	163	524
負面詞彙用量	涉及核武典則	N/A	N/A	64	19	N/A	N/A	83
	涉及生化武器典則	0	0	N/A	N/A	0	N/A	0
	涉及核武典則及區域議題	N/A	0	114	34	N/A	0	148
	涉及生化武器典則及區域議題	42	11	N/A	N/A	28	N/A	80
	區域議題	5	12	27	203	70	65	382
案 例 數 量	涉及核武典則	N/A	N/A	77	37	N/A	9	123
	涉及生化武器典則	2	8	N/A	N/A	3	N/A	13
	涉及核武典則及區域議題	N/A	1	240	53	N/A	2	296
	涉及生化武器典則及區域議題	36	12	N/A	N/A	22	N/A	70
	區域議題	12	10	37	168	71	188	486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明：* N/A 代表沒有這類案例，0 代表有這類案例，但沒有使用這類詞彙；其次，本表合計案例數量共 988，係因有 6 個案例同時提及核武典則及生化武器典則所致；最後，在案例 I、II、III、IV 中均有涉及「典則及區域議題」或「區域議題」的情形，但這四個案例的這兩類情形均涉及中國，例如中國對巴基斯坦轉移核能技術、六方會談等；因而這四類案例的情形與僅涉及他國的案例 V 及 VI 不同。

** 包括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NPT)、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 (CTBT)、核供應國集團 (NSG)、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 包括禁化武組織、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 禁化武公約、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澳大利亞集團。

**** 同時指稱核武典則的 4 個條約或組織以及其他國家，例如北韓、伊朗、美國、巴基斯坦等。

***** 同時指稱生化武器典則的 3 個條約或組織以及其他國家，例如敘利亞、北韓、伊朗、美國、日本等。

實際上，圖 2 及表 4 反應的現象與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對民族主義的塑造及宣傳相仿。在民族主義的塑造過程中，中國將會遭受生化武器攻擊的歷史記憶鑲嵌在二戰的歷史記憶之中，中共宣傳的重點有三：使用生化武器違反國際公約、日本在二戰期間使用生化武器的紀錄與日本清除遺留在陸的生化武器進度與拖延。例如新華網（2002）的「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訴訟索賠案專題」、中國軍網（2022）的「侵華日軍遺留化武仍在戕害中國人民」。被指定為中國大陸中小學生閱讀叢書之一的《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也鉅細靡遺地描述日本使用生化武器與進行相關實驗的證據（徐光春，2015）。

中國過去基於塑造民族主義為目的而戮力宣傳的歷史記憶限制其對化武擴散的政策；相反地，中國對其未曾著力宣傳的核武反擴散議題之態度和政策變的有所不同，更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當「封閉體系」（closed system）擁有既定意識形態之際，政策實踐是否符合意識形態將影響政治穩定（Hagan, 1987），中國也同樣受此影響（Hunt, 1996: 229-230; Kornberg & Faust 2005: 19; Chong & Hall, 2014）。這也是當中國僅需回應涉及生化武器反擴散議題之際，其態度通常正面且緩和，而唯有在這類議題涉及其他區域議題或國家，方會以負面詞彙應對，特別是當這類議題涉及美國及日本時，而這也是中國民族主義所假定的對象。相對地，同樣是應對涉及透明化或進出口管制，北京對核武擴散的負面態度更為明顯，北京不會因為議題的性質而自我設限回應模式，即便僅涉及透明化或進出口管制，北京仍傾向以負面詞彙回應這些議題，顯示北京對核擴散議題的考量及限制與化武議題完全不同，並不會因為過去的歷史記憶與宣傳立場而調整其回應態度。

二、主權原則的影響

另一方面，主權原則產生的影響則較為複雜，因為這些議題——透明化與進出口管制，均涉及國家安全威脅與實際的政策利益。中國對

透明化的考量不僅考慮到主權，更考慮到是否可能產生侵犯中國主權的情報行為，例如在《全面禁止核試爆條約》的談判過程中，中國堅持不讓渡任何偵察權力給予獨立審查機構 (Rajain, 2005: 176)，而直到簽署該約之際，中國依然反對任何國家濫用該約賦予的偵察權力或者任何因此而侵犯中國主權的情報行為 (Gill, 2001: 260-261)。而進出口管制涉及到部門利益的問題，在諸多涉及解放軍或對外貿易的案例中，均可見到部門利益影響的痕跡，第一個案例為中國各部門對《武器貿易條約》談判的立場，即便外交系統贊同簽署該約，但解放軍與相關國有企業仍持反對意見 (Stavrianakis & Yun, 2013: 7-8)；第二個案例則為中國對維和行動的人力貢獻，能源企業的投資相當顯著地影響了中國貢獻人力的傾向 (游智偉, 2019)。

圖2的交叉比較呈現了中國在不同條件下對生化武器與核武擴散、透明化與進出口管制原則的偏好。整體來說，同為生化武器擴散，中國對透明化議題的態度 (coef.=0.2, $p<.05$) 較進出口管制 (coef.=0.14, $p<.05$) 負面；同為核武擴散，中國對透明化議題的態度 (coef.=0.3, $p<.05$) 也較進出口管制 (coef.=0.17, $p<.05$) 負面。其次，同為生化武器或核武議題的條件下，中國對透明化議題的態度波動大於進出口管制——亦即在更傾向使用負面詞彙的同時也使用更多的正面詞彙，而對核武議題的態度波動也大於生化武器議題的波動。

從透明化和進出口管制的性質來說，中國對透明化議題的態度相當合理，因為透明化議題對主權的傷害更甚於進出口管制的傷害——即便多數的透明化措施很難對主權造成實際傷害。透明化本身帶有相當濃厚的囚徒困境性質 (Chayes & Chayes, 1998: 145)，多數國際裁軍與軍控條約或典則並無獨立查驗機制的設計，多數倚賴締約國集會審查或不具備查驗機制，少數包括生化武器與核武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查驗機制則委託協力廠商行使。以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為例，該公約第九條與「執行核查附件」(Annex on Implementation and Verification)

指出：被視察國家可指派人員隨行、規範觀察員的活動範圍及時間、並有權利採取措施保護敏感裝置和防止洩漏無關《化武公約》的機密資料及數據。

即便委託協力廠商執行的透明化機制未必涉及主權原則，中國對這類議題的回應仍相當負面，但若議題涉及生化武器，北京的容忍度也會有所提升，亦即北京較不傾向以負面詞彙應對涉及生化武器之透明化議題。以數據來看，當透明化議題涉及生化武器之際，北京使用負面詞彙的傾向 ($\text{coef.}=0.2, p<.05$) 遠低於當議題涉及核武 ($\text{coef.}=0.3, p<.05$) 之際。表 3 也反應相同邏輯，在涉及生化武器透明化議題之際，北京僅在涉及區域議題或其他國家之際方使用負面詞彙，而在僅涉及生化武器典則與透明化議題的條件下，北京並未使用任何負面詞彙應對。然而，在僅涉及核武典則的條件下，北京在 77 個案例中使用 64 個負面詞彙；而在同時涉及核武典則與區域議題之際，北京則在 240 個案例中使 114 次負面詞彙。

前述數據同樣也反映民族主義的影響，面對涉及歷史記憶的生化武器議題，北京更不傾向使用負面詞彙，因而其容忍度較高；若為涉及主權原則的透明化議題，北京更傾向使用負面詞彙，其容忍程度也較低，不論該議題或實踐是否造成實際影響。前述兩個現象反映著民族主義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在不考慮是否影響主權的條件下，若議題涉及生化武器之際，北京的容忍度較高，除非議題涉及其他國家或區域議題，否則北京不會以負面詞彙回應之。而當議題涉及主權之際，北京的態度更為負面、也更傾向使用負面詞彙，這種情形在涉及透明化之際更為明顯，因為透明化與協力廠商查驗——即便實踐上有其困難，往往涉及主權的讓渡。而進出口管制雖同時造成主權的讓渡及實際的利益傷害，但嚴格來說，進出口管制並未涉及讓渡內政或國內事務的權力，更多的是傷害部門利益或經貿利益。

中國應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也許能相當程度解釋中國應對進出

口管制的政策。除兩者性質類似之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發現透過長期參與將有助於取得掌握與制訂議程和規則的能力（Bergsten, 2008: 65），可有意識地忽略或寬鬆執行相關對其不利的規定，例如智慧財產權（Mertha, 2006）。而實際上，中國應對進出口管制的政策也與此相似。在實踐上，北京並沒有完整地將國際核武典則的進出口法規國內化，因而偶爾出現中國出口相關技術至伊朗或巴基斯坦的案例。然而，在生化武器的議題上，北京便幾乎將所有國際生化典則的規範國內化，因而幾乎未曾出現中國違反生化武器進出口規定的案例。

陸、結論

本文嘗試結合文字探勘與個案研究分析中國政治菁英之間的民族主義面貌，並檢視歷史記憶與主權原則的影響。本文發現：歷史記憶對中國相應政策具有相當明顯的影響，因為中國對生化武器擴散的態度較對核武擴散的態度嚴峻，同時中國對國際反生化武器擴散典則的遵循程度也較高——同樣在言論與行為均呈現相同現象。第二個發現則是主權原則的影響，主權原則也會影響中國對相同議題的態度，但不同的是中國對透明化議題的態度較為負面，但若考慮到議題性質（生化武器或核武擴散），北京對生化武器透明化的態度又較其對核武透明化的態度寬容，這可能源於中國民族主義對生化武器與核武的不同歷史記憶、以及對主權完整的堅持。

對民族主義的研究與對特定對象的情緒分析在議題光譜上更接近「反思主義」（reflectivism）一側，但在方法上導入文字探勘卻可有助於在理性主義的框架下處理這個問題，因為文字探勘可同步處理大規模的資料，並透過數學模型與統計方法的檢定賦予這些檔實證上的意義。嚴格來說，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並不困難，但仍可清楚地呈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 2000 年到 2021 年間 982 筆對話中的態度變化。對

傳統的質性研究方法來說，文字探勘的研究方法至少有兩個優勢：第一，有助於以一致的標準檢視大量的政策檔，過去相關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領域）對政策檔的檢視相當倚賴人工，可即便是相同研究者，長時間的檢視也可能導致不自覺的標準偏差，而文字探勘可避免此困境，同時又有效地縮減分析時間。第二，有助於檢驗標準與研究經驗的傳承，研究者對政策檔的解讀往往有賴於長時間的接觸與田野調查的經驗，這是臺灣在中國研究的優勢，但隨著中共緊縮言論空間與疫情的影響，田野調查風險增加的同時，機會也隨之減少；而透過關鍵字與阻斷詞的挑選，文字探勘的方法則有助於保留過去研究者對政策檔的解讀能力及視角，並進一步精煉更有效解讀方式。另一方面，對量化的研究方法來說，文字探勘除可節省建立事件資料庫的時間和人力成本之外，更重要的是可進一步推展到情緒分析與機器學習，這些方法將有助於以人工智慧模擬與推演可能的情境發展，在政策或實務面上也許可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不論是情緒分析或機器學習，關鍵在於如何選擇指標與投入精確的資料，而這部分則更倚賴質性研究者長期的田野經驗和觀察。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中國外交部（2013，9月11日）。〈外交部發言人就敘利亞國內反對派組織將訪華等答問〉。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345738/1345738.htm。
- 中國外交部（2014，4月15日）。〈外交部就中方圍繞搜尋馬航失聯客機所做工作等答問〉。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368187/1368191.htm。
- 中國外交部（2017a，10月25日）。〈外交部就19大勝利閉幕答問〉。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570641/1570641.htm。
- 中國外交部（2017b，4月8日）。〈外交部就中美元首會晤談及敘利亞問題答問〉。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547366/1547366.htm。
- 中國外交部（2018a，4月12日）。〈外交部就中澳關係等答問〉。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627361/1627361.htm。
- 中國外交部（2018b，4月16日）。〈外交部就中印關係近期保持發展勢頭等答記者問〉。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627674/1627674.htm。
- 中國外交部（2020a，7月16日）。〈7月16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683732/1683732.htm。
- 中國外交部（2020b，7月17日）。〈7月17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683836/1683836.htm。
- 中國外交部（2021a，6月4日）。〈6月4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

Document/1705776/1705776.htm。

中國外交部 (2021b, 9月29日)。〈9月29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714355/1714355.htm。

中國軍網 (2002)。〈侵華日軍遺留化武仍在戕害中國人民〉。http://www.81.cn/2015ylhw/index.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里約熱內盧總領事館。(2020, 6月5日)。〈駐里約總領事李楊發表署名文章《德特里克堡的罪惡還要延續多久?!》〉。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里約熱內盧總領事館：http://riodejaneiro.china-consulate.gov.cn/zlghd/202006/t20200605_4988612.htm。

徐光春 (2015, 6月5日)。〈全面反應抗日戰爭歷史的重要讀物：讀《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605/c1001-27107663.html。

袁易 (2004)。《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典則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五南出版社。

袁易 (2005)。〈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再審視：一個權力政治與身份證治的解析〉，《問題與研究》44(4)：108。

游智偉 (2019)。〈部門利益對中國維和政策的影響：對解放軍訓練與能源國企海外投資之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20(2)：95-144。

新華社 (2011, 9月18日)。〈日本侵華罪證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出〉。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1-09/18/content_1950253.htm。

新華網 (2002)。〈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民間訴訟索賠案專題〉。http://www.zj.xinhua.org/special/japan/japan.htm。

顏聲毅 (2004)。《當代中國外交》。復旦大學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Arbman, G. (2003). Nuclear Transpar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Nuclear Weapon States. In N. Zarimpas (Ed.), *Transparency in Nuclear*

- Warheads and Materials: The Political and Technical Dimensions* (pp.112-12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gsten, C. F. (2008).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87(4): 65.
- Brely, N. (2010). *The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 <https://ctbtcourse.files.wordpress.com/2010/10/overview-and-technologies-of-ims.pdf>.
- Chayes, A., & Chayes, A. H. (1998). *The New Sovereignty: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vrier, M. I. (2007). Biological Weapons Terrorism and Transparency. In O. Nikbay, & S. Hancerli (Eds.), *Understand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Terrorism Phenomenon: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pp.35-42). IOS press.
- Choi, J. (2010).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G. Faure (Ed.), *New Dynamic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Asia: How to Build the Future from the Past?* (pp.33-48). World Scientific press.
- Chong, J. I., & Hall, T. H. (2014). The Lesson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 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9(1): 7-43.
- Dahl, T. (1983, May 26). *Japan's Germ Warrior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3/05/26/japans-germ-warriors/a0149d21-ba27-460e-a807-d3db942ba507/>.
- Fruchterman, T. M. J., & Reingold, E. M. (1991). Graph Drawing by Force-directed Placement. *Software -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21(11): 1129-1164.
- Gill, B. (2001).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Policy-Making in an Era of Reform. In D.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pp.257-28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A. (2020).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Reassurance,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5(1): 164-201.
- Gries, P. H. (2004).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ies, P. H., Zhang, Q., Crowson, H. M., & Cai, H. (2011).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China's US Policy: Structur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China Quarterly* 205: 1-17.
- Guang, L. (2005). Realpolitik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Modern China* 31(4): 487-514.
- Hagan, J. D. (1987). Regimes, Political Oppositions,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reign Policy. In C. W. Kegley Jr., & J. N. Rosenau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pp.339-365). Unwin Hyman Ltd press.
- Hao, Z., & Cherg, H.-Y. S. (2020). State-led Chinese Nationalism: An Analysis of Primary School Textbook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8(4): 27-48.
- Higuchi, K. (2017, August 3). *KH Coder 3 Reference Manual*. http://khcoder.net/en/manual_en_v3.pdf.
- Hunt, M. H. (1996).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 I. (2008). *Social Stat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 I. (2013).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4): 37-42.
- Johnston, A. I. (2016/17). Is Chinese Nationalism Rising? Evidence from Beij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1(3): 7-43.
- Kent, A. (2007). *Beyond Compliance: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Secur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1-18.
- Kornberg, J. F., & Faust, J. R. (2005).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Lynne Rienner.
- Kumar, V. (2014). *India an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The Perennial Outli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 R. (2016). China's Sea Power Aspirations and Strategic Behaviour in

- the South China Sea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E. Fels, & T.-M. Vu (Eds.), *Power Politics in Asia's Contested Waters: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p.117-138). Springer press.
- Mertha, A. C. (2006). *The Politics of Pir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Muller, H., Becker-Jacob, U., & Seidler-Diekmann, T. (2013). Regime Conflicts and Norm Dynamics: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In H. Muller, & C. Wunderlich (Eds.), *Norm Dynamics in Multilateral Arms Control: Interests, Conflicts, and Justice* (pp.51-81).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Quek, K., & Johnston, A. I. (2017/18). Can China Back Down? Crisis De-escalation in the Shadow-of Popular Op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3): 7-36.
- Rajain, A. (2005). *Nuclear deterrence in Southern Asia: China, India and Pakistan*. Sage Publications Inc.
- Ross, R. (1998). The Strategic and Bilateral Context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Why Domestic Factors Matter. In R. Rose (Ed.), *After the Cold War: Domestic Factors and U.S.-China Relation* (pp. 3-39). An East Gate Book press.
- Ross, R. (2009). Chinese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 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2): 46-81.
- Ross, R., & Li, M. (2016). Xi Jinping and the Challenges to Chinese Security. In R. Ross, & J. I. Bekkevold (Eds.), *Chin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pp.233-251). Georgetown University.
- Schneider, F. (2021). COVID-19 nationalism and 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sovereignty during China's coronavirus crisis. *China Information* 35(3): 301-324.
- Sossai, M. (2013). Transparency as a Cornerstone of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 Regimes. In A. Bianchi, & A. Peters (Eds.), *Transparency in International Law* (pp.392-41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avrianakis, A., & He, Y. (2013). *China and the Arms Trade Treat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the Sussex Centre for Conflict and Security Research.
- Townsend, J. (1992).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 97-130.
- Weatherley, R., & Zhang, Q. (2017). *History and Nationalist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 Weiss, J. C. (2014).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lf, H. (2000). Transparency in Armaments and Other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J. Goldblat (Ed.), *Nuclear Disarmament: Obstacles to Banishing the Bomb* (pp.85-98). I. B. Tauris.
- Xinhua. (2021, June 2). *Uncovering link between U. S. biological lab and Japan's WWII germ warfare uni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6/02/c_139985242.htm.
- Yahuda, M. (2013).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2): 454-455.
- Zarimpas, N. (2003). Introduction. In N. Zarimpas (Ed.), *Transparency in Nuclear Warheads and Materials: The Political and Technical Dimensions* (pp.1-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 (2004).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o, S. (2013).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2): 537-538.
- Zhu, L. (2018, December 17). *Film explores Unit 731 and its dark wartime past*. China Daily.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1812/17/WS5c17bd30a3107d4c3a0014bb.html>.

Nationalism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Regimes: The Influences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Sovereignty

*Chih-Wei Yu**

Abstract

This essay attempts to combine two approaches—text-mining and case study—to investigate whether n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political elites is existential? If this sort of nationalism does exist, how do the core concep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specifically the memory of the history after 1840 and the war exper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cause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of Chinese political elites toward different issu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adouts about China's reflections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and nuclear weapons made by the spokesperson of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between 2000 and 2021. Meanwhile, this study categorizes these statements into six cases based on the memory about history and sovereignty. In summary, this study finds that: China exhibits a more positive stance towards biological weapons proliferation and tends to endorse non-proliferation norms for biological weapons. This is because China's historical memory, promoted to shape nationalism, restricts its attitude towards biological weapons proliferation. A similar phenomenon does not appear in China's approach to nuclear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cwyu@mail.cpu.edu.tw

weapons proliferation issues. Sovereignty principles also influence China's attitudes towards the same issues. China holds a negative view on transparency issues, perceiving them as infringements on sovereignty, whereas it adopts a more positive stance on export controls, which it views as within its domestic authority. Finally, when issues only involve transparency, China is less inclined to use negative language specifically towards transparency issues related to biological weapons, reserving such negative words for regional or international issues.

Keywords: China's Foreign Policy, Non-Proliferation, Transparency, Nationalism, Sovereignty